

# 新时代新征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的历史文化沃土

陈泽环<sup>1</sup> 徐可<sup>2</sup>

(1.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 200234; 2. 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指明了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的前进方向, 而且也使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的历史文化沃土。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精神财富; 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历史和群众基础; 最广大公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结构支撑可作为理解这一命题的三个基本方面。

**[关键词]** 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①</sup>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方面, 就要努力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之时代精华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它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长期历史过程, 因此, 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和论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 是十八大以来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的一项重大成果, 为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的历史文化沃土之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共有精神财富, 不断夯实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实践方向。有鉴于这一“两个结合”思想、特别是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发展思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包括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指导意义, 以下拟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历史和群众基础、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结构支撑三方面, 对“新时代新征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谈一些学习体会。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重大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资料整理与研究”(19ZDA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泽环(1954—), 男, 浙江宁波人,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哲学、伦理学。

-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年, 第21页。
-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年, 第18页。

##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精神财富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sup>②</sup>对于这一“两个结合”的新时代党进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尤其是关于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思想之发展的精神实质,当前许多学者都作了有益的理解和解读,通常认为第一个结合,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并坚持的最宝贵经验,也是党的事业不断成功的法宝,其精神实质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关于第二个结合,则更需要有新的理解。因为,虽然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始终都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就理论上的概括和发挥而言,过去虽然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了接近和类似“两个结合”的观点,例如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这么说过:“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先进思想的精粹。而在中国起作用的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这就不能简单地称为‘西学’了。指导中国革命达到成功的是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应是与中国优秀传统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sup>①</sup>不过在党的正式文献中则还没有这样凝练的概括。现在,新时代党的最高文献已经明确地提出和论证了这个结合,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新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文化自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sup>②</sup>、“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意境上的熔铸与升华”<sup>③</sup>,其精神实质在于强调“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sup>④</sup>。显然,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文化和文明观,并由此进一步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指明了方向。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的历史文化沃土,为把握这一深刻揭示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中之重要性的思想,我们首先必须更充分地认识和更深入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之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文献不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高度认定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而言,可以说除了以上及其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支撑、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镜鉴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这么说的根据是:“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sup>⑤</sup>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中走出来的。在漫长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中华民族从古到今走着一条独特的文明发展道路。就近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牺牲、奋斗和创造,特别是新中国的持续探索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根源上说则是出自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文明。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正是这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人民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要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以中国式

①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

② 郑必坚:《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北京:外文出版社,2021年,第238页。

③ 杨威,上官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证成与发展路向》,《齐鲁学刊》2022年第4期。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15页。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继续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文化土壤和历史根基,必须坚守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否则不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伦理和文化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树也将由此失去其得以根深叶茂的中国历史文化沃土。

其次,由于在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问题时,已经涉及了中华文明独特性和文明的交流互鉴等范畴,这样就有必要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中重要性的又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精神财富。当然,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基于文化哲学对文化和文明的概念作一简要界定。由于“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sup>①</sup>,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形式,空间和时间成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本质属性。对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考察,既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别进行,也要综合空间和时间两种本质属性。当前,我们一般所说的文化主要指相对于经济、政治的精神文化(狭义的小文化概念),突出文化受经济、政治制约又反作用于经济、政治的文化时代性(时间本质);但我们同时又在文明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至少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文明构成的广义大文化),突出文化的民族性(空间本质),即文化作为民族或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sup>②</sup>。基于对文化和文明概念的这一界定,再来理解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就可以确认:“从空间维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饱含丰富的中国地域元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代表的文明类型;从时间维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对于过去的文明类型而言的,尤其是相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文明形态而言的。”<sup>③</sup>有了这样的界定,笔者就可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重要精神财富的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呈现,从民族性的本质属性来看是中华文明的新形态,从时代性的本质属性来看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形态,从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综合角度来看则是当代世界历史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标志:“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四个基本元素: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激活了的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中国实践、借鉴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sup>④</sup>其中以“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为特征的中国思想理论资源自然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价值与精神基础”<sup>⑤</sup>。在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首先发挥着一种特殊性的精神财富之功能,但由于“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sup>⑥</sup>,从而又是具有普遍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意义的文化资源,成为创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类共有精神财富。这样,鉴于上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的简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精神财富,可以说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和同时,强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际上是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和同时,更确定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之内容构成中的重要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方法到内容的一大迈进,既是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的必要条件,又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路径,必将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沃土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8页。

② 相关详细论证可参阅陈泽环《文化自信中的文化观与伦理学——三论新时代伦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陈泽环《文化传统与伦理学——当代道德哲学的思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第277页。

③ 曹鹏飞:《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答问》,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22年,第12-13页。

④ 曹鹏飞:《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答问》,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22年,第20页。

⑤ 曹鹏飞:《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答问》,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22年,第7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7页。

树日益根深叶茂。

## 二、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历史和群众基础

以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精神财富角度简要地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的历史文化沃土,即对其在新时代新征程中重要性的初步理解;在此基础上,以下拟从“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的目标出发,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的思想,继续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并由此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要思想的理解。一般说来,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多方面的。对于这种多方面的关系,按照作者的初步理解,至少包括超越性、差异和互补性、高度契合性三方面。所谓超越性,指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时代的伟大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时代性上超越了中国古代农业封建和郡县社会中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超越了其中作为封建主义意识形态那部分的思想文化,并由此成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基础。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互补性,这主要是从思想文化的民族性角度立论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首先作为西方文化和文明的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作为中华文化和文明的精华,从文化和文明的不同类型即从文化和文明的民族性角度来看,显然是存在差异的,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这点在以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精神财富方面已经有所体现并得到了基本论证。

当然,在初步探讨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超越性、差异和互补性关系之后,为实现“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的目标,我们现在更要注重两者之间的高度契合性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sup>①</sup>这一论述为我们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指明了方向。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20世纪之初,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传播到中国大地之后,为什么能在各种外来思潮和价值观主张的激荡竞争中被中国人民所选择,除了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要求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契合利于认同,认同利于接受。正是这个高度契合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创立和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同样也是这个高度契合性,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获得丰富的文化滋养和牢固的文明根柢,并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的历史文化沃土。从而,确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之间具有高度契合性,作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必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牢固文明根柢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仅获得无比充沛的思想文化资源,而且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页。

也必将使马克思主义更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大地和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

其次,从思想理论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之间的高度契合性也合乎人类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例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传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对于这种“天下为公”的思想,近年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古代朴素社会主义”<sup>①</sup>,并认为这种“中国古代朴素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这当然是一种有价值的学术观点,至于合理与否可以探讨。但无论如何,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逻辑角度来看,这里显示出“中国古代朴素社会主义”与欧洲空想共产主义之间的契合性,特别是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则是不能否认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现代西方思想家弗洛姆的相关论述。在批判现代西方的“最高价值是强于他人,战胜他人,奴役他人及剥削他人”的同时,他指出在19和20世纪,只有马克思等思想家才是17和18世纪启蒙运动人道理想、人类共同体理想的真正发扬光大者<sup>②</sup>。而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sup>③</sup>鉴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和空想共产主义者当时对中国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推崇和接受,“17世纪是欧洲启蒙运动酝酿和近代哲学形成的时期。适逢其时,以儒学为载体的中国思想文化流行于欧洲”<sup>④</sup>;这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不仅可以从对其思想理论上之共同点的分析中得出,而且还能够得到作为中国与欧洲文化和文明交流互鉴之积极成果的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的证据。

总之,以上的初步阐述说明,确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不仅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之初就会被中国人民所选择,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更加根深叶茂。就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而言,正是这种高度契合性表明:由于其中深深地渗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百年来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再造”“家国共同体的传承与转型”“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民族精神坚守与弘扬”,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柢”<sup>⑤</sup>,而且也为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提供了深厚和牢固的历史基础。对此,我们不仅在理论和学术上应该不断深化其论证,而且可以和必须坚定这一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毫不动摇,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就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而言,以及中华文明根柢的深厚和牢固,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的广泛和久远,它已经成为中国悠久和深远的社会基本结构和中国人民普遍和深层的道德心理结构,成为中华民族大多数成员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鉴于中国的历史悠久和广土众民,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这样体现和发展出的一种最广泛群众性,显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人民心中牢牢扎根。而这种作为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扎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化发展中,集中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最广大公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结构支撑。

① 张维为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0页。

② 相关详细论证可参阅[美]弗洛姆《占有或生存——一种新型社会的心灵基础》,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30页;陈泽环《敬畏生命:阿尔贝特·施韦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1页。

④ 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视域下“中国”哲学的互动与融通》,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87页。

⑤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 三、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结构支撑

在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的历史文化沃土,落实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文化建设上,就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落实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公民道德建设上,就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努力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而在这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作为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吸收了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体现时代精神,还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自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党的文献始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确立和培育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中的重要性,“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吸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sup>①</sup>。基于这一认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确立、培育和弘扬中的特别重要地位,我们现在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就不可能确立和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可能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有生命力和发挥影响力的文化基因和丰富营养。

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历史文化沃土的公民道德建设展现,不仅体现在党和国家的相关实践和理论创新中,而且也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社会、公民三层面与《大学》“三纲领”和“八条目”的理念和价值同构中。《大学》作为中国传统儒家全面和系统申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经典,以孔子的“修己安人”为指导,把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结合起来,不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贯通后,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提出、培育和弘扬产生了建设性影响。例如从“三纲领”来看,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价值理念类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德,既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之德,也是一种大德,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之德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之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确立和提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使全体中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这也是一种“至善”的目标。而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来看,这种价值上的同构性就更为明显:“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sup>②</sup>这样,从确立和提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广度和深度。

除了在价值理念和价值结构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类似和同构之外,在新时代新征程中,

<sup>①</sup>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70页。

<sup>②</sup>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

《大学》的“三纲领”和“八条目”作为一种社会道德生活结构和个人道德心理结构的基本框架,作为一种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一种体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融通和贯通起来,并吸取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必将成为我国最广大公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结构支撑。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运动来说,1840年以来,当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时,为什么中国人民会奋起反抗、仁人志士会奔走呐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并通过一百年来的奋斗、牺牲和创造,终于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中华文化和文明独特的道德生活结构根源来看,这显然是与由《大学》“修己安人”的社会道德生活结构所奠定的“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民族精神坚守与弘扬”密切相关的。而从微观个人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生活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道德生活结构中并逐步形成相应个人道德心理结构的人,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与生活在个人主义社会道德生活结构中的人相比,比较容易进入从个人的道德修养(修身)到负起自己家庭责任(齐家)的道德生活轨道,并由此也比较可能接受和认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治国)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平天下)的目标。因为,基于中华文化的立场,作为一种个人道德心理结构和社会道德生活结构,从“修身”经“齐家”到“治国和平天下”是一条比较自然递进的路径。而生活在西方个人主义社会道德生活结构中并形成相应个人道德心理结构的个人,由于种种文化、文明和政治上的原因,除了容易陷入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外,即使从最理想的状态来看,也往往会从个人道德一下子跳跃到全人类和世界主义,而不太重视家庭和国家,例如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阿尔伯特·施韦泽<sup>①</sup>。

总之,虽然由《大学》的“三纲领”和“八条目”所奠定的社会道德生活结构和个人道德心理结构的基本框架,在中国古代农业封建和郡县社会中构筑了一种比较周延的道德生活世界,始终成为中华文明持续绵延的道德根基和生命活力,但由于其时代性的局限,并不可能单独地使中国社会发生近代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在经过了现代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当代中国社会中,通过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融通和贯通,通过吸取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则能够展现出其独特的当代价值,发挥我国最广大公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结构支撑之功能。这就是说,作为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一种重要体现,这一道德生活框架包含着一种特殊的伦理认同:“个体对高于自己的家庭、国家之伦理共同体,自觉地承载着不推卸、不逃避的伦理义务、道德责任。”<sup>②</sup>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提供支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因素,即中国人对国家的伦理认同、社会责任意识及个人的勤勉品质等,往往出自个人对家庭、国家之伦理共同体承担有义务的伦理思想和道德生活,而且能够提供秩序因素,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义利之辨’的道德观念对作为社会秩序之核心的国家权力重心的形成,和社会生活中行为失范之危机的消解,具有明显的助益作用”<sup>③</sup>,等等。显然,这种社会道德生活结构和个人道德心理结构,在当代“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中,特别有益于培育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美德,激励他们去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到家家仓廩实衣食足,又让人人知礼节明荣辱”<sup>④</sup>,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历史文化沃土的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也由此充分开显出来。

(责任编辑 万旭)

① 相关详细论证可参阅陈泽环《敬畏生命——阿尔伯特·施韦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页。

② 崔大华:《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自序第6页。

③ 崔大华:《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自序第11页。

④ 习近平:《开启亚太合作新篇章——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解放日报》,2022年11月18日第3版。